

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

——现代性札记之一*

黄 平

Abstract: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offers critical analysis and comments of Anthony Giddens'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and *The Third Way*, both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recently published in China. While Giddens's books, inclu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nd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are becoming influential amongst Chinese academics and readers, there are few reviews on his writing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ho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Giddens's books in China, locates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debates on Modernity and the Third Way in the post Cold-War contexts, and argues there are possibilities and alternatives for us to analyze today's global trends and to think of the future.

吉登斯对现代性和第三条道路的论述,建立在他对两种理论路径的分析批评的基础上:一是“主体—客体”、“个体—整体”、“人类—自然”、“国家—社会”、“市场—政府”等二元叙事这样的二元叙事,自启蒙以来统领着学术界思想界的主流话语;二是启蒙话语中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这种“进化”论把复杂的社会变迁看成是“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分阶段的自然演化和递进过程。

和当代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努力一样,吉登斯看到了这类二元论和进化论的困境,揭示了它们所造成的遮蔽,他力图要超越这种二元化的简单对立和进化论的“自然进步”,试图要展现被二元论、进化论所忽略的社会“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的复杂特性和多维向度。

但是,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带着浓厚的一元论和欧洲中心论色彩。比如,在他的叙述中,“现代性”只有一个(即 the Modernity,而不是 modernities),其“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Giddens, 1990)他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的理解,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也很难看到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抗等等)。所以,尽管近30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自启蒙以来的二元论和进化论的阴影,我们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

* 关于吉登斯,我前几年写过一点“评述”(包括《吉登斯评传》),说是评述,实际上是述而不评。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版他的论著,社会理论界除了古典,谈论较多的是哈贝马斯等,我觉得对吉登斯略作介绍而不是评论,是有好处的。这两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三联书店已经翻译出版了几本他的专著,我自己参与翻译校对的《现代性的后果》和《第三条道路》两本小书,也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著作做点评论,是需要的。在朋友们的催促和鼓励下,我写了这些文字,它们只是一些不成系统的“评论”,因为其不成系统,严格地说只能是札记。这里发表出来的,是这部分札记的摘要,更详细的文本将刊于《视界》2000年第1期。

现代性的反思性

与如今许多人热衷于用令人目眩的概念(如“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去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明显不同,吉登斯主张,与其宽泛地谈论和使用这种种新概念,还不如努力去探索和说明: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越来越迷惘,从而也越来越怀疑我们获得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可能性?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被我们至今还不仅无法完全理解,甚至基本上都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无数事件和现象所纠缠?吉登斯的立场很明确:“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性。”(Giddens, 1990)

这里,吉登斯的路径还是某种变了形的“现代化”思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进化论(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阶段论),认为现代性对于原有社会秩序的“断裂”(discontinuity),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基本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把我们抛离了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的轨道;另一方面,他又把现代性看作是唯一的、由低向高演变着的对各种传统秩序的“超越”。关于“阶段论”问题,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与过去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类型之间的“断裂”或非连续性,他也明确地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区别于那种认为社会的变迁在于其“内部”所发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自然演化。但是他又费力地区分低级的与高级的现代性。

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现代性是不是有低级与高级之分,而在于评价它们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的还是也可能有别的维度?欧洲型的还是也可以有非欧洲型的?历史的变革如果不是按部就班地分阶段走,是否也是可以区分出类型的(例如吉登斯就区分过农业帝国与民族—国家)?如果可以,那么现代性是不是也可以(或可能)有不同类型?如果可能,它们只是欧洲现代性的变形,还是也有源自非欧洲的变迁因子?

16-17世纪到今天的三四百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虽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但是,这几百年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具有戏剧性,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些转变以前的知识中获取理解它们的钥匙时,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Giddens, 1990)

吉登斯的这个论断,和我们传统的知识论明显地有所不同:今天的知识难道不是在过去几千年基础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吗?人类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不再使用“进步”这个概念的话)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推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在这里,过去的知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充其量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

吉登斯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什么现代性的非连续性这么长时间以来居然并未受到社会科学应有的重视?为什么我们一直还以为过去的知识仍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处境?

这里,究竟是吉登斯太看轻了人类几千年(如果不是几万年,几百万年)的知识积累,还是我们太看重了传统的魔力?连极力主张与传统观念实现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不是也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恶梦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吗?如果过往的知识只能给我们十分有限的帮助,那么历史学(甚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是历史科学”),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和今后,还有多大意义?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特别强调断裂或革命的重要性。但是长久以来,整个社会理论就一直存在着进化论的影响,连马克思也把社会变迁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

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根据历史进化论的这种“宏大叙事”，历史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主线”，其把人类活动的变迁框定在一幅井然有序、前后相连的不间断的画面之中：历史从小小而孤立的狩猎和采集文化开始，然后进入农业种植与畜牧社区，最后以现代社会的出现为其终点。这样，剩下的问题无非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如何向世界其他地区伸延，是以殖民一战争的形式扩张，还是以其他更温和、更文明的形式扩展。

毫无疑问，如果想要解构社会进化论，就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或者，不应认为历史遵循着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或普遍性原则。但是，这是不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混乱或混沌之中，我们不但根本就无法认识它们，甚至产生认识它们的企图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狂妄”？或者，人们是否能够任意书写、“建构”完全迥异的“历史”？

现在，我们对标识为“后现代”的理论的种种质疑，大都要么是坚持进化论的基本立场，坚信人类确有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原则”（只不过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罢了，而是诸如理性原则、市场原则、法制原则等等），并且，坚信这种原则的确是按照进化的程序，一步一步演变而来，既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便得以实现，却又最终不可抗拒；或者，同时也固守连续性的原则，认为对过去的认识一定能够使我们弄清今天并通向具有确定性的未来。后现代理论的种种说辞，不过是在玩弄时髦辞藻的背后掩盖自己的虚无或空虚而已！

吉登斯当然比这两者都更具有“理性的狡猾”：他认为确实存在着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件和制度，人们能够辨认其特性并对其加以概括。

生活在 20 世纪末的人都能看见，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吉登斯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和演讲、谈话中，都明确承认，能够享受这数不胜数之安全和生活的机会的人，在经济一政治乃至地缘一种族的意义上，是极不均衡的。但是，他很少具体展示这种不均衡所包含、所带来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比较不那么看重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之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而更倾向于乐观地假定，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初级现代性所包含的不平等会在高级现代性中得到解决。

吉登斯也重视现代性的阴暗面，但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论你生活在哪里，都不能逃避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其中特别是战争。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论述仍然是十分醒目的。下面这三个段落几乎完全援引自《现代性的后果》：

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极为重视现代性所提供的“机会”，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作用。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业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人去服从那索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的甚至是使人变得愚蠢的劳作。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的拓展所具有的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竟有那么大。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环境一生态问题完全就没有被融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另一个例子是强制行使政治权力。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岁月里才有的事情，“专制主义”似乎只是前现代国家才有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极权主义，以及 20 世纪的其他事件，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专断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之中。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连为一体。权力如此紧密和高度的结合形式在民族一国家产生之前几乎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

另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暴力的扩张。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创始人对“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当然，生活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社会思想家,不可能预见到原子弹的发明及其后果,而工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结合也会有一个过程。遗憾的是,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加以分析,而是坚定地相信,同以前的时代相比,现代性的秩序主要是和平!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人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原子弹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军事冲突,这两者构成了现代性在本世纪的最主要的“阴暗面”。实际上可以说,20 世纪就是战争的世纪。本世纪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假设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话,生命的丧失将会更令人惊恐,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核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一定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关于战争,过去的社会学家谈得太少,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旧的学术分科的体系内,战争似乎应该是历史学、军事学以及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在战后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中间,吉登斯是首批将战争(与暴力)纳入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人之一。他不仅提出了战争与工业化、民族—国家与暴力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把战争看作是现代性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和基本形式。指出战争与现代性的这种关联,恰好意味着现代性绝不只是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在“理性化”的名义下也充满了流血的战争史,只不过有了理性化(或文明、进步)的旗帜,战争就可以(被进步论者)正当化和合法化。

不过,吉登斯仍然是在抽象层面谈论战争的。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区分现代性过程中的对外殖民的战争与抵抗这种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区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反侵略战争?正如我们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是否还要区分宗主国的民族主义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来自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源自民众的民族主义?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吉登斯自己也开始变得乐观起来,他甚至提出假设:人类第一次有可能进入了“没有敌人”的时代!(Giddens, 1998)然而,就在《第三条道路》出版不到一年时间内,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了轰炸“手术”,在几乎所有的报章杂志电台电视上,不论其立场是什么,“战争”(WAR)都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北约轰炸的关键词。吉登斯可以说是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中,最注重战争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人之一,然而即使是他,也对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有如此乐观的认识。

说到认识,不仅又使我们回到了前面关于过去的知识在多大意义上是有所帮助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如何认识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制度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学在自然领域所作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其他学者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用历史来创造历史”?

吉登斯认为,后一问题比前一观点更为深刻,但是它仍然是不充分的。“用历史来创造历史”,实质上只是一种现代性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原则,它体现的,是现代性的反思特性(Reflexivity)。社会学与其所对应的主题(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s)才能加以理解: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有赖于作为所谓“外行人”(Laymen)的主体行动者们(Agents)自己的概念;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嵌入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去。社会学的知识或明或暗地、或强或弱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这个“反馈”过程,既重构着社会学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

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本身(Giddens, 1990;Giddens, 1984, 1993)。

这是一个反思性的模式,而绝不是像传统的社会学认识论所主张的那样,一方面是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的日积月累;另一方面,是铁一般坚硬并普世化地控制着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学(以及其它同现存人类打交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按照人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那种方式来积累知识。从根本上说,所有人类活动都包含着反思性。不论具体做的是什么,人们总是与他们所作事情彼此“纠缠不清”,这样,人作为主体行动者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作事情的内在因素。

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有一段著名的话:

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对主体的外在制约,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Giddens, 1984: 25)

人作为行动主体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在检验和改造各种关于它们的认识的同时,也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又不断改变着自己。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至少部分地正是由它的主体行动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阐明的那样,人们总是知道自己是该“如何继续行动”的,虽然作为当事人或“外行”,他们并不一定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认识上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认识上的新发现,又总是不断地反馈(“嵌入”)到社会实践中去。

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我们的习俗才会被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和再造,由此才被如此明显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从技术上对物理世界的粗暴干预。人们常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追求为标志,但现代性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的设定,它甚至也包括对反思性本身的反思。

只是到了20世纪之末,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种反思性的前景其实是多么地不确定。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个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性世界中,我们似乎是无处不在。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卡尔·波普说过:“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漂移不定的沙滩之上。”(Popper, 1962: 34)用吉登斯的话说,在似乎是绝对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现代性是漂泊不定的。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确定性还必须加上“破坏性”(甚至“毁灭性”)这一条,其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话语都要重新再嵌入(reembedding)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由于启蒙运动和推崇理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区别开来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那些偏爱诠释型社会学而非科学型社会学的人,也常常把社会科学看成是自然科学的可怜巴巴的副产品。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嵌入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性制度的关键之所在。(Giddens, 1984: chapter 7)

进一步说,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以经济学为例,诸如“资本”、“市场”、“价格”、“投资”等许多概念现在所具有的意义,构筑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

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不是所谓的“外行人”事实上也按他们自己的理解掌握了上述这些概念(以及其他许多概念),现代经济生活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如今我们许多人都在批评甚至抱怨“不规范的市场”、“黑市”、“假货”,却比较少意识到,“完全的市场”只存在于某些经济学学派的理想的模型之中。这里所涉及的,还有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这些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关键词”(Williams, 1976),没有千千万万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的人对诸如“资本”、“市场”、“劳动”等这些关键词的理解(不管这些理解是否“准确”),就不会有今天的市场;而今天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为外行的行动主体的人们对它的接受、理解一致的,既与他们是否接受、理解“市场”一致,也与他们怎样接受、理解“市场”一致。

在各部门社会科学学科中,社会学也许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这部分地源于它用最易被公众接受的方式去反思现代的社会生活。例如,由政府公布的关于人口、婚姻、犯罪等官方统计数据,似乎提供了某种精确研究社会生活的路径。对科学型社会学的先驱们来说,这些统计数据代表着硬性资料,凭借它们,现代社会的相关方面就能得到(比起缺乏这类数据的方面来说)更为准确的分析。然而,统计数据并不只有测定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且它们也会制度性地反馈到从中它们得以被收集并由它们所测量或描绘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自有统计之日起,核对数据本身就成为了国家权力和许多其它社会组织模式的建构因素。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对这些“官方数据”的每日每月的统计,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比较熟悉今天各级各部门都往统计数字里“掺水”,却没有怎么意识到这里其实不仅是所谓“弄虚作假”的问题。再认真的统计员,也有他们自己对于统计指标的理解,再严肃的被统计者(“外行”),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对于被问概念的“诠释”,而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的统计数字,每被使用一次,就会被其使用者再“创造性地转换”一次。现代社会(民族—国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被统计数字体现出来的,而且也是由于统计数字的嵌入而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双重诠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占支配地位的统计数据,背后也隐藏着占压倒优势的诠释理论,而当人们用占压倒优势的诠释理论再去“说明”统计数据时,这些数据本身也就又一次次被“反思性地”再编织起来了。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启蒙理性所确立的原则就坚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其实往往只是得到了部分经验支持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这里,除了权力、价值的作用外,“未期望之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一个关键^①。人们所积累的关于社会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完全涵盖它的对象的各种情况和可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稳定的社会世界、它可否让我们去认识以及我们的认识是否“准确”,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会使得这个世界不断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又不应该因此就认为:既然关于人类行动和社会运动趋势的系统性知识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可能性也就不值得认真地思考。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么人们唯一可能做的就是完全拒绝任何智力活动,包括拒绝“游戏式的解构”,剩下的只是从事健身、养身之类的活动(如果不是纵情声色或赌博的话)。解构启蒙话语,绝非否定任何认识活动的意义,而是试图揭示由于启蒙式的“宏大叙事”(如把历史看作是进化的、阶段的、整体的、被统一性所支配的,却没

^① 也可译作“与初衷不符的结果”或“始料未及的结果”,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来的,但是他却(几乎是徒劳而自相矛盾地)试图在传统的功能主义框架下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吉登斯把反思性引入分析,才(继现象学与阐释学之后)在社会学理论中比较清晰地阐述了为什么人类的社会活动总是会产生产未期望之结果,并且这种结果又总是会反过来成为主体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

有作为“外行”的主体行动者不断卷入并不断反思的过程)所造成的可能的智力遮蔽和“理性狂妄”。严格地说,把“POST—ISM”译作“后××主义”本身就是误导性的。“后”在中文里所隐含的,正是当代这些理论(既包括吉登斯等人所试图坚持并阐发的现代性理论,也包括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人想解构的“现代性叙事”)所批评的阶段论。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其长期以来致力于从理性化思想中清除所有传统和教义中的“废物”的结果,最直接地发现了现代性是不确定的。现代性,就其核心而论,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使我们能够“解除”这种迷惑。我们在曾经似乎有过明确答案的地方又不断遇到新困扰和难题,而且,对这种困扰和难题层出不穷的现象的普遍意识慢慢地逼迫着每一个人进行反思,它渗透进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虑之中。

这种忧虑的体现之一,就是欧洲和西方霸权日渐衰落。确实,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衰落”一直是欧美许多思想家重点关注的课题。但是,吉登斯辩证地看到了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的日渐减弱,恰恰是它们全球性扩张的结果。“西方的衰落”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组织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这里的问题在于:在欧洲的现代性之外,也许还有别的现代性?或许,还有超越—突破西方现代性的可能?

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

古典社会学的观点或理论倾向,是寻求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阐释:如现代性究竟是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还是工业化的(涂尔干),抑或是理性化的(韦伯)?这种分析和争论的前提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包含了一种化约论和还原论。吉登斯试图做的是综合各家之长,再填补各家之短。他建立了一种分析现代性制度的四维模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国家的监督和对信息的控制,以及绝非不重要的军事力量、暴力和战争的工业化(参见附图)。正是这四个维度的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才有了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也才有了我们熟悉而又不甚了然的现代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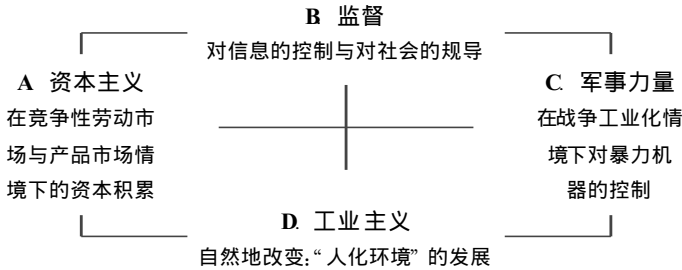
吉登斯十分注意马克思的论点:在把现代社会生活从传统世界的制度方面分离开来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企业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按照马克思的诊断,资本主义所有的再生产都是“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无论是在其外部还是在其内部,无论是在民族—国家范围的内部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就其本性来说,都是扩张性的,其经济秩序不可能像存在于过去大多数传统体系中的情形那样,维系在一种静态的平衡和地域性范围之中。

在1998年吉登斯同英国政治学家克里斯多夫·皮尔森(Christopher Pierson)之间进行了关于现代性的长篇对谈中,后者问吉登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中,你是否觉得韦伯的理论对今天更有说服力?并且因此,“我们现在都是韦伯主义者了”?吉登斯的回答与他自己的多篇著作给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出人意料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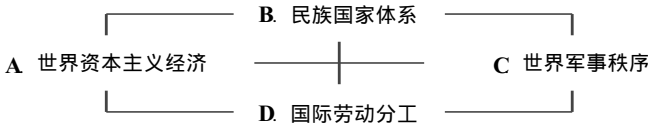
我并不如此认为……或者说,我们不能认为韦伯的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而其他人(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却没有能够如此,……在70年代初,当我写《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时候,那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帕森斯)忽视马克思并认为他的著作已经过时了。今天的情况又是这样,理由却似乎更充分了,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但是我对马克思的看法基本上没有改变。就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和性质而言,以及就围绕它们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而言,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

展所作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性质的论述是正确的：这是一种无休止扩张而无法停歇下来的体系，其毫无遏制的市场力量导致了贫富的两级分化，也导致极少数商人对市场的控制。马克思的问题(也是其被认为是最大的成就)在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去实现它？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之中，却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见的社会主义去替代它。(Giddens & Pierson, 1998: 6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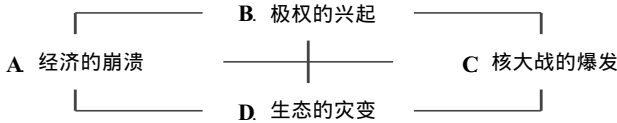
1. 现代性的制度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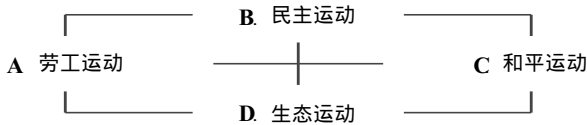
2. 现代性的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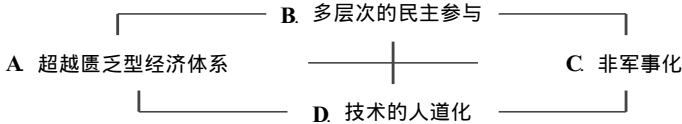
3. 现代性的风险



4. 全球条件下的社会运动



5. 乌托邦的现实主义



图示：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英文字母 A-D 表示对应关系,线条表示交互作用)

由这四个维度编织起来的现代性正在内在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说,在传统的社会学中,所谓“社会”,其实就是指的社会,或者,更准确的说,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整个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

内来提出问题并展开研究的。随着科技—经济—金融和文化媒体的全球化过程的出现,民族—国家范式正在受到极大的挑战。例如,当中国社会正试图加速自己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的时候,整个外部的发展环境已经不再简单地只是如何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联的问题了,而且也包括着如何与越来越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的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关联的问题。这种情势,迫使许多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和视角都面临着改造或转换的压力。如何将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体现这种情势和压力,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精确地从理论上概括这一现象?全球化意味着原有民族—国家的消解,还是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展?是现代性在全球层面上的扩张,还是多元化时代(甚至后现代时代)的到来?如果我们的确正在迈入全球化时代的话,那么,如何看待与此同时各地都正在出现的地方化趋势?它们是对全球化的抵抗,还是全球化的另外一种表现?有没有可能建立起全球化的社会学?或者,我们不过是把原来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扩展到全球范围而已?

10年以前,当斯克莱尔发表他的《全球体系的社会学》(Sklair, 1990)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时连吉登斯也觉得离开民族—国家体系谈跨国化(全球化)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甚至是一派胡言!

即使是今天,在社会学的既有文献中,对全球化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种种讨论,几乎都不能与今天变得如此重要的全球化过程本身相协调。但是,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其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城市问题,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某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全球的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其结果并不一定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综合性变迁,相反,甚至通常是彼此相背的趋向。另一个例子是正在欧洲和其它地方兴起的地方—民族主义。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相联的民族感情,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地方自治与区域认同日益增强的势头。

吉登斯特别强调全球化所具有的辩证特性。例如,伴随着全球化,作为联盟、战争或各种政治与经济的变迁的后果,在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失去主权时,另一些国家的主权却在增强。他当然也越来越意识到沃勒斯坦(E. Wallerstein)对世界体系的论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经验分析上做出的巨大的贡献。^①

沃勒斯坦绕开了社会学家们通常所热衷的“社会”概念,而更倾向于用全球化关系(Globalised Relationships)概念去分析问题。他所说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在地理上不断延伸的经济关系网络,其先于现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明显地有别于在过去三四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格局。早期的世界经济通常以大的中央帝国为中心,而且曾覆盖帝国权力中心所能企及的周边地带。根据沃勒斯坦所作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秩序,因为它第一次在空间跨度上真正成了全球性的,并且更多地是建立在经济(即“世界资

^①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的前2卷已经在已故的罗荣渠先生主持下翻译成中文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但是,罗先生去世后,该书第3卷的翻译工作似乎没有继续下来,而由另外一位译者翻译完毕的全3卷,则由于版权问题而不能出版,这实在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世界体系下知识—权力关系的体现。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富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一书的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这本原名*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的著作1998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获得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富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试图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作一次总的清算,包括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兰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在内的理论都在他的清算之列。该书出版后,引来和沃勒斯坦和阿明等人的严厉批评(参见 Review, January, 2000)。

本主义经济”)之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商业和工业的关联而不是通过政治中心而整合为一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因此分成了三大组成部分:核心地区、半边陲地区和边陲地区,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区域性的定位也在改变。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早在现代社会的初期,资本主义就开始在世界范围伸延了:“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决从不允许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划定自己的扩张野心。”(Wallerstein, 1979: 19)

沃勒斯坦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的某些限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摆脱了在对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强烈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他仍然把现代社会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由是之故,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的影响,却对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的现象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吉登斯把世界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之一。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维度是世界的军事秩序和战争秩序。几乎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拥有大大超过了前现代文明中最强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很弱,军事力量却很强。吉登斯甚至提出,在武器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三世界”,因为拥有原子弹已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了。最近的印巴核实验,以及传说中的朝鲜的核能力,就是最清楚的说明,它们对“第一世界”(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个冷战概念的话)造成的忧虑,甚至并不亚于当年的苏联。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军事秩序之下,在这样的秩序下,作为战争工业化的结果,现在已扩散到全世界的核武器具有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力量。核冲突的可能性所造成的危险,是以前世代的人从未面临过的。风险的全球化,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说明就能感觉到的问题。贝克指出,这种全球性的风险不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也不管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区别。“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的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差别(Beck, 1992)。

但是,我们绝不能对下述基本事实视而不见:与前现代世界中的情形一样,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许多风险在上流社会人士和下流社会平民之间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不同的阶层面临着不同的风险。例如,在食物—营养水平和对疾病的感染与治疗方面的风险,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风险,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特权”和“无权”、包容性和排斥性)的主要内容之一。

所以,全球化,并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又一次带给我们希望的机会,倒不如说,它如同现代性本身一样,是一种悖论。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不仅是“全球化的准确含义是什么?”这样教科书式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全球化仅仅是指经济的全球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还是也意味着在技术—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更多的领域里的全新格局?如果说,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是南北、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那么为什么反倒是右翼的政党和个人在起劲地反对全球化并主张排外和保护主义?

更进一步说,我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现代性(包括它的全球化)这头看似不可驾驭的猛兽或怪兽?或者,我们是否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风险并增大其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控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那“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21世纪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现代性和全球化究竟会带来什么能够预期的和不能预期的后果?对未来不作任何担保和许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在20世纪末期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除

了必须具有社会学的敏感外,它是否对内在的制度性转变也必须保持警惕?它是否必须意识到,在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环境中,道德的承诺和“美好的信念”潜在地也可能是很危险的?它在意识到现代性的风险与道德许诺的危险的同时,是否也绝不放弃它的批判锐气和未来的理想?如果还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乌托邦理想,那么,它应该怎样看待和卷入过去的和现在的各种抵抗或反思现代性的阴暗面的社会运动?

如果我们只关注劳工运动,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唯一的重要动力与维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早期工人运动,还是以建立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当代市场运动,似乎都在认识论上犯了同样的毛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唯一的制度性根源,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定它还是肯定它,视它为万恶之源或幸福之本。吉登斯则试图说明,除了劳工运动外,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也很重要,它们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曙光,而且,在某些方面,它们构成了通向未来的桥梁。

但是,女性运动在哪里?如果我们稍微仔细一点回顾战后的过程,就会看到,西方出现的女性运动,不仅使性别与性的问题进入了学术的视野,成为对传统社会科学提出严厉挑战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过去的社会科学,都是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吗?或者,它们在研究阶级、民族、种族、地区的分化,探讨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不是充满了男权主义的偏见和歧视?我们是必须重构现有的社会科学体系,还是仅仅加进性别的视角,就可以克服或避免原有社会科学的局限?男女平等或女性解放,除了妇女参加工作和选举等经济、政治活动之外,是否还有话语方面的革命性意义?我们在反思启蒙话语的时候,是不是意识到了,如果不从更深刻的层次上检讨整个体系的困境,而仅仅加进一点所谓女性主义视角,仍然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启蒙话语(不过更加精致罢了)?

未来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敢保证。苏式的社会主义虽然明显地与资本主义大相径庭,但它却型构了一种经济上低效、政治上集权的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当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所涉及的东西差异太大,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术语简直就是无所不包,它甚至可以是任何特定思想家所希望看到的任何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所以,简单地谈论要不要“社会主义”也可以让人摸不着头脑。吉登斯认为,如果把社会主义只理解为按计划严密地组织生产(并主要在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内按计划去组织生产),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就会衰落。

具有对照意义甚至是讽刺意义的是,正像当初人们简直恨不得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一样,冷战后的“共识”是:人类的一切问题(如果还不是一切罪恶的话)皆源于此。很多人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潜台词:“要是当初不是社会主义,那就……”。一些自称是历史学家的人,在检讨苏联和东欧的痛苦经历和教训的时候,基本不考虑历史因素的复杂性,只是重复一个如同常识一样的东西:社会主义带来了那么多“人为的”破坏。然后,就马上转向曾经被诅咒了无数次的资本主义大本营,认定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向来是“起点平等”的,甚至连屠杀印第安人和贩运黑奴的事实似乎也要么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么就是“进步”的代价和“先进对野蛮的征服”。

如果允许我们暂时撇开别的问题不谈,单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说,社会主义,特别是苏式的计划社会主义,确实严重忽略了市场;马克思的理论也曾经设想共产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的。但正是被严重忽略乃至恨不得要尽快消灭的市场,提供了在复杂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体系中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机制。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正像马克思准确判断的那样,市场也积极维持着(甚或还疯狂生产着)主要的剥夺形式。超越资本主义不仅将意味着超越资

本主义所带来的阶级划分,它将进一步超越用经济标准决定人类的整个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制度环境。吉登斯在这里提出了他自认为是适用于全球范围的超越匮乏型体系(post-scarcity system)的可能性。

但是,人们不得不问,在这个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为标志的世界上,特别是在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和不发展社会之间^①的大量不平等仍然是主要问题的世界上,在资源不仅有限而且已经成了压力的情况下,超越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吗?吉登斯的回答是:让我们反过来问一句,为了寻求一个不是沿着自我毁灭之路而行的世界,我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追求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但大多数资源原本并不少,所谓“匮乏”,除了保证肉体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对于社会所界定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所创造、所激发的“需求”和生活方式。现在,一方面,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的许多人都患了“发展疲劳症”;另一方面,在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的人还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苦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哪里的人们,都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人们要追求的最高和唯一价值,除非增长能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Miles & Irvine, 1982)。

19世纪以来,进步—增长—发展—现代化曾经一直主宰着或影响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路。中国社会也在近20年来进入了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而正是这20年来,进步—增长—发展—现代化的社会学范式在理论和经验的层面上都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各机构、各群体的怀疑、批评和批判。特别是由于20年来,在二战以来进步—增长—发展—现代化范式的指导下的发展规划与发展模式,无论是世界各国内部还是各国之间,不是导致了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而是贫富悬殊的扩大,社会不公的蔓延,社会安全与信任的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的巨大风险。但是,来自批判学派的种种非难,如果不能提出什么可替代的方案和日程,则这样的批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理论和方法上的说服力和穿透力,并在实践上引发虚无主义或悲观厌世。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社会及其机构、组织、社区的再造,在什么意义上将不只是按照“丛林规则”进行的?有没有可能在确保基本的社会公正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持续与人文发展?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最近发表的UNDP《1999年度人文发展报告》用大量的数据表明,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两极分化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不仅南北差距拉大了,而且发达社会内部(例如美国社会内部)的差距也拉大了;其不仅体现在经济财富和经济收入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性别、种族、区域、对技术的占有和使用等上面。拿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说,只有世界人口19%的富国和经合组织成员国,却拥有全世界91%的网络用户。全球化已经在富国与穷国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群体之间制造了一条日益加深的鸿沟。“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1上升为1997年的74:1。”(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如果说,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概念至少在发达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蓝领工人越来越少,投票所反映的越来越不是阶级取向而是其他类型的群体取向);在发展中社会(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阶级问题也越来越和诸如种族、性别、

^① developed, developping, underdeveloped 这些概念,严格地说都不是没有问题的描述性术语,它们本身就预设了发展主义的阶段论的假设。关于“发展主义”,我将在“发展主义的悖论——现代性札记之二”中加以说明。

国家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越来越显示出复杂性;那么,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正迎来一个资本主义高奏凯乐曲并使得人人都受益的全球化时代。

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写《第三条道路》这本小册子的背景非常明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工业化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福利共识”的瓦解;80年代末以来苏东社会主义体制的瓦解;与此同时,市场原教旨主义又并没有能够缓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二难困境。

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的信誉受到严重质疑,而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商品和文化正在席卷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异常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的原委是什么?人们应当怎样来回应这些变化?

“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它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已被使用过许多次。吉登斯自己也说过,叫“第四条道路”、“第五条道路”都行,关键是如何跳出不是福利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计划社会主义)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例如撒切尔主义)的二元论。

吉登斯从一开始着手理论研究,就特别明确地要超越主体与客体、结构与行动的二元论,这样才有了结构化的理论尝试。如果说,在理论的层面想要将二元论改造成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那么,在政治的层面借用一句老话“第三条道路”,也没有什么奇怪。特别是在今天,当欧洲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鼓动力,公共讨论的主题成了各种各样的担忧(道德水准下降、贫富悬殊加剧、福利国家的压力等等)的时候,就更可以理解。

“如果没有理想,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如果理想与现实的可能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Giddens, 1998)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超越左与右?结构与行动的二重性理论到底是折中主义还是理论创新?“第三条道路”是在探索一条新路,还是仅仅把自己摆在中间偏左(Centre-Left,或者,用左翼的话说,是中间偏右)的位置?吉登斯自己认为,冷战结束后,“已不再有极左了,但却有极右。”(Giddens, 1998)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属于过去。自由市场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 Von Hayek)以及其它站在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古怪偏执,那个时候似乎大家都成了福利社会主义者甚至计划社会主义者。哈耶克们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撒切尔夫人大力鼓吹和推动,又才形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吉登斯告诉我们,撒切尔夫人刚刚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羽翼丰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她执政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型的。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无动于衷,或者甚至是对不平等的积极支持。她认为,只有“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人才会认为“社会不平等天然就是错误或有害的”。在撒切尔夫人眼中,平等主义的政策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平等主义政策只能借助于专制力量才能推行。撒切尔夫人几乎是第一个把“资本主义”明显地作为褒义词使用的人。在她的口中,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无比美妙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撒切尔主义以后,人们才渐渐习惯了大言不惭地谈论资本主义。然而,吊诡的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政策却又把机会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甚至更有讽刺意味的

是, 约翰·梅杰接任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后, 学着模仿马克思的语气, 宣布在他的保守党领导下要把英国建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首要特征就是对“大政府”的敌视。英国保守主义之父艾德蒙·柏克(E. Burke)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嫌恶, 他认为国家的过分扩张会变成自由和自主的敌人。美国的保守主义则一直保持着对中央政府的敌意。撒切尔主义利用了这些思想, 但它同时还利用了对于国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义怀疑论, 这种怀疑论的基础是关于市场优越性的经济学论证。使国家最小化的理论与把公民社会视作一种社会团结的自生机制的独特观点紧密相关。这种理论认为, 必须有条件让公民社会的弱小力量得到发展, 而且, 如果没有国家干预的阻碍, 它们就能凭着自己的力量逐渐发展起来。

有人说, 如果任由公民社会来展现其自发秩序的话, 它将具有如下诸种美德: “良好的品格、诚实、义务、自我牺牲、荣誉、服务、自律、宽容、尊重、公正、自强、信任、文明、坚忍、勇气、正直、勤勉、爱国主义、为他人着想、节俭以及崇敬。”(Green, 1993: viii) 据说, 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但市场则不会如此, 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自主性。正像公民社会的秩序一样, 如果任自由市场自行发育, 它们将为社会创造出最大的利益。

关于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讨论, 在很大程度上, 是和苏东体制的瓦解密切相关的。但是, 在这种讨论中有一种几乎是天真而幼稚的假设: 要是没有 70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本来俄国和东欧也会像西欧和北美一样富裕和民主的。这种论调甚至忘记了, 要是没有 70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俄国和东欧甚至也还意识不到西欧和北美的体制下还会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不只是效率)。不论历史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被简单地遗忘或干脆抹去, 至少, 在“1989 年, 自封为‘自由世界’的一方都沉浸在由于共产主义的瓦解而得到的狂喜之中。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似乎显而易见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冷战结束了, 从今以后, 人人都将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Calhoun, 1993; 邓正来、亚历山大合编, 1998: 332-370) 这是新自由主义得以流行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心理背景, 尽管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并没有向哪怕仅仅是东欧和俄国的人们尽情展现出来, 巴尔干的军事冲突不过是一例而已, 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是更大更深的忧虑和麻烦。

需要注意的一个吊诡是, 新自由主义不仅主张“小政府, 大社会”, 而且还把不受拘束的市场力量对传统制度(特别是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联系起来。个人的能动性需要在经济领域得到保护和发展, 但责任与义务则应当在其它领域中得到保留和维护。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明中, 仇外主义的情绪溢于言表, 他们保留着自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最严厉的非难, “美国优先”仅仅是被布坎南(J. Buchanan)明确说出来的口号。

在吉登斯看来, 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 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 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戛然而止。但是, 再也没有什么比市场的力量更能消解民族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包括家庭), 它也不断地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 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 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继续恪守传统; 而且, 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 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存共生形式。

反对福利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成是当代欧洲一切问题(甚至一切罪恶)的源泉。“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 正像我们现在

会嘲笑地说奴隶制当然是组织有效率、又有动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Marsland, 1996: 197)

那么，在福利国家垮掉之后，由谁来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福利不当再被理解为国家的救助，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到这一切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

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把那些指导他们参与地方性事务的哲学运用于全球的层面。如果市场能够在不受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作，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将达到它的最佳状态。但是，正像他们也是传统民族观念的维护者一样，新自由主义者采纳了一种在国际关系上的现实主义理论策略：全球化社会仍然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社会体系，在这个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权力，包括军事权力。为战争作好准备并维持军事实力，是国际体系中的民族—国家的必要因素。因此，新自由主义同时又致力于维护政治—军事在民族—国家层次上的统一性。

现在，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毕竟，社会民主主义正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如果说50年以前人人都主张计划的话，那么现在再没有人是计划的鼓吹者了。

但是，吉登斯还不甘心，也不愿意看到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全球化胜利：

150年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作为制度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

(Giddens, 1998)

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似乎已经高歌凯旋的世界上，社会民主主义者又该向何处去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在某些观点上与共产主义者相一致，既然共产主义作为体制在欧洲已经垮掉，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普遍受到人们的怀疑，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哪怕是中—左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吗？面对这种情景，在欧洲寻求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式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独特的“第三条道路”还有什么可能吗？

当宣称左翼和右翼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左与右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欧洲是否仅仅处于左与右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著作，人们是否还要承认，左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并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是否可以说，当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和右之间划分的适当性存有疑问，而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边变得强大起来，则更为强大的那一边，就会如撒切尔夫人那样，宣布你“别无选择”？

左和右的区分是围绕着对待平等的态度展开的。这里必须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人之间的平等，比如，个人之间的还是集团之间的平等？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机会的，结果的，还是过程的？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是纵向（上下之间）的还是横向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机构以及越来越臃肿的官僚制是否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民主机制？如果某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又如何来贯彻它、操作它？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吉登斯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他认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应当对全球化（其范围是比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全球化市场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而极右派才主张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他们将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的完整性和传统价值的威胁。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说道，如果失掉传统和传统的各种形式，权威就会瓦解，人们就将失去分辨对与错的能力。这样一来，民主就永远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吉登斯认定，保护主义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够在实践中被采纳，也只能制造一个自私的、各经济集团之间很可能相互敌对的世界。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在今天的社会中，无责任即无权利，同样，无民主即无权威。

与其他的现代性批判者不同，吉登斯是主张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只不过不是线性的现代化，而是“反思的现代化”。在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而且也绝对不可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现代化问题对于第三条道路政治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生态现代化只是其中的一个视角，反思的现代化也只是说作为主体行动者的人对现代化的卷入是积极的能动的过程；但在其他方面，现代化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超越传统（post-traditional）？“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怎么超越？民主化家庭（democratizing family）？民主化民主制（democratizing Democracy）？规约（Regulating）经济、商业、金融与货币？这些都是吉登斯提出的方案，也都是未完成的议程。每一种概念都不是毫无问题，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有争议，并且也很棘手，能不能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完成”也是个疑问。

拿民主化民主制来说。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着某种危机的话，这并不是因为它受到满怀敌意的竞争的威胁（就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民主制的危机根源于它不够民主。问题并不在于是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怎样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

民主本身的含义，绝不仅仅只是几年一度的代议制选举，它还包括对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的民主化（而不是金钱化）监督，在选举之外的领域（如经济领域）里的民主式参与，不同的阶级、阶层、种族、性别、群体在各种公共事务上的权利与权力的合理分布和相互制约，在传统的民主政治理论不曾涉及的领域中（如家庭中的男女、长幼之间）的平等对话机制和沟通机会的制度保障，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如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的运作规则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几乎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不足。我们不能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现代性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和危机（例如“战争的工业化”），也不应仅仅注意到发生在那些虽然未经选举，却也属于现代的民族—国家里的暴行，而必须看到，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是被德国人民选举上台的，而日本对二战中的侵略暴行和滥杀无辜不做检省和公开道歉的历届政府，也是经国民选举出来的。在民主问题上，真正负责的理论，既不能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也不能实用主义地搞什么“比坏”（即“总比×××好”），更不用说，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包括长时段和跨区域）的分析，比较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平等。平等与个人自由当然可能会产生冲突;而且,平等、多元主义与经济活力之间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欧洲和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说明,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既有集团的,也有个人的;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既有阶级一阶层的,也有种族一性别的。这些不平等,在现有体系内能被有效地克服吗?吉登斯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要想探索“第三条道路”,就绝不当接受下述观点: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因而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

许多人认为,当下唯一的平等模式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机会均等与精英统治(meritocracy)。但是如果这种模式确实实现了的话,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而不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胜者为王”或“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似乎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规则和现象。某个仅仅比别人稍微能干一点儿的人就敢要求比别人多得多的工资。一位网球明星或著名歌剧艺术家所获得的报酬远远超过那些比他们只是稍逊一筹的同行。这种现象正是由精英统治原则的运作所造成的。如果微弱的边际差异真的就能够决定产品的成功还是失败,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这种风险也实在是太大了。被承认为造成了这种边际差异的个人得到的报酬与他们的实际贡献是不成比例的。他们俨然成了一群“新贵”(Frank & Cook, 1995; Robison & Goodman, 1996)。

不止于此。精英统治的社会还会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动。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范围广泛的向下流动(失业裁员下岗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还有其他许多没那么明显的形式,如隐性失业,实际收入下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会产生无法预期的负面后果,并使那些受到这些后果影响的人产生疏离感甚至敌意。大规模的向下流动对社会凝聚力造成的威胁很可能不亚于一个充满敌意的被排斥的阶层的存在。事实上,完全的精英统治将制造出这样一种极端的阶层形态,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等外阶级(underclass)。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些群体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还意味着他们也认定自己在能力上的欠缺使他们命该如此。吉登斯问道: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社会图景吗?

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他们的幸福与尊严。正如穆罕默德·尤诺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知道还有人生活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如果我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尊严,那么我们自己的尊严也会变得空洞和虚伪。”(富格桑雷、钱德勒,1998:4)

平等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才和能力,从而会损害社会本身;日益不平等还会威胁到社会的凝聚力。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三条道路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作对于维持人的尊严和生活质量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就理所当然地是“机会”的基本内容。

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如果从“包容性”——“排斥性”的视角来看教育,则不得不指出,按照精英统治的逻辑和规则搞出来的精英教育,是以排斥或剥夺许多人的受教育机会为代价来使少数人被“包容”进已

有的教育体制的,从贵族学校到名牌大学,都是这种体制的产物^①。

排他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当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个全球化所包容进来的是哪些群体,排斥出去的又是哪些群体?如果说全球化是一列飞驰而来的高速火车,那么它在使一些人搭上它从而迅速摆脱困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甩下另一些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已经退出竞争的老人),甚至干脆拒绝让一些人(例如 UNDP 报告中说的那些无力上网的人)上车。

如今,有人认为,经济不平等已经太过火了:

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放任型经济是世界经济史上升时期的一个瞬间,而不是它的终点……毫无疑问,把世界经济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自由市场将会增加不稳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术和不受节制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它没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经济均衡的活动受到制约的手段……实际上,它是把全球的未来作为赌注压在这样一个猜想之上:毫无拘束的逐利行为所导致的未曾期望之结果,将使那些巨大的风险得以消解。我们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加不计后果的赌博了。(Gray, 1998: 199-200)

这样说来,一种“积极的福利国家”是可能的吗?答案部分取决于具体的情景,部分地取决于人们怎么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条道路”,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框架,不如说是某种行动的大纲;在这个大纲中,“第三条道路”政治要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健康,变无知为终身教育,变贫困和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这就是吉登斯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吗?这种试图把乌托邦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是不是也如现代性一样,包含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悖论呢?

参考文献:

富格桑雷、钱德勒, 1998,《参与和发展》,杜晓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Calhoun, C., 1993, “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No. 4, December, 1993; 并见邓正来、亚历山大合编, 1998,《国家与市民社会》,第 332-370 页。

Frank, R. H. & Cook, Philip J., 1995,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Giddens, A. & Pierson, C., 1998, *Conversation with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ddens, A., 1984,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中文版已收三联书店“学术前言”系列出版)。

——, 198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中文版已由三联书店“学术前言”系列出版)。

——,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中文版将由译林出版社“社会与文化”系列出版)。

——,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Revised edition, Polity Press.

——, 1998, *The Third W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中文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联合出版)。

^① 甚至体育也体现着这种精英原则:少数人被包容进冲刺和金牌的圈子的条件,是多数人被排斥到健身的行列之外,或者,充其量,被宽容(“包容”)进观众和球迷的群体而已。

- Gray, J. , 1998, *False Dawn*, London: Granta.
- Green, D. , 1993,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
- Marsland, D. , 1996, *Welfare or Welfare Stat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Miles, I. & Irvine, J. , 1982, *The Poverty of Progress*, Oxford: Pergamon.
- Nordau, M. , 1892(1968) , *Degeneration*, New York: fertig.
- Popper, K. , 1962,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Raz, J. , 1986,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obison, R. & Goodman, D. , 1996, *The New Rich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 Sassoon, D. , 1996,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London: Tauris.
- Sklair, L. , 1990,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London, Harvester, Weatsheaf.
- Vattimo, G. , 1988, *The End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llerstein, I. , 1979,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Wallerstein Immanuel(ed.),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lfe, A. , 1998, *One Nation, After All*, New York: Viking.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宛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20 周年庆祝大会在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 20 周年庆祝大会 2000 年 3 月 21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老前辈费孝通和雷洁琼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 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李英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魏久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何秉孟等领导, 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京津地区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代表 200 余人出席会议。李铁映为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20 周年题词“团结、稳定、进步、发展”, 费孝通的题词是“开风气、育人才”, 雷洁琼的题词是“继承优良传统、提高研究水平”。会议由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发表了题为《社会学大有作为》的讲话。社会学老前辈费孝通和雷洁琼也发表了讲话。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景天魁作了主题发言。他对社会学研究所 20 年来所取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一、满足社会需要是立所的前提; 二、以学术为立所之本; 三、学科建设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 四、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相互促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代表在京社会学界兄弟单位、天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侯钧生代表京外社会学界兄弟单位,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 2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华安德、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主任顾里勉也专程到会祝贺。

(赵克斌)